

「再次變成中國人」：論辜鴻銘的雙語寫作與國族想像

林 文 心^{*}

提 要

晚清文人辜鴻銘（1857-1928）出生於英殖時期檳榔嶼的華僑世家，於 13 歲時留學英國，並取得西方文學碩士學位。然而在其學成回國後不久，便對中國文學與文化產生極大的認同，並將《論語》、《中庸》等儒學經典重新英譯。辜鴻銘生長於多語混雜的語境，中文（漢語）為後天習成，於是就辜氏的文學實踐而言，其母語習成與文化認同之間發生裂隙。同時，辜鴻銘對於中華（中國）文化的擁護也顯得不合時宜，無論是在民國時仍堅持留辮，或者強力主張恢復帝制

本文 109.02.15 收稿，109.07.0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2007_(50).0006

等，諸如此類的復古主張招致當時許多新文化知識份子的批評，與胡適等革新派發生過多次論戰。

以辜鴻銘作為個案，關鍵即在於其所透顯的問題同時牽涉了「華夷」與「古今」的辯證。自清末民初始，新文化人呼喊強調的西學挪用、拋棄傳統，在辜鴻銘身上亦是完全反向的徑路。故本文從文化翻譯的角度出發，借鑑於對離散情境的觀察，意圖分析辜鴻銘雙語書寫中所隱含的歷史複雜性。即便「中國」賦予了辜鴻銘歸屬感與認同感，「中文」卻仍是其所陌生的語言；然而，正由於辜氏對中文的不熟練，於是其中國認同、歸屬必須仰賴其他語言（多為英文），才得以顯現。「再次變成中國人」為辜氏之語，本文以此為題，意圖強調辜鴻銘所面臨的、在國族與語言之間的尷尬困境，透過此一特殊例子，亦能見出當華與夷交互辯證、時代新舊出現融混之時，文學個體於其中的掙扎與矛盾。

關鍵詞：辜鴻銘、翻譯文學、跨語際實踐、國族想像

Become Again A Chinaman:

On Ku Hung Ming's Bilingual Writing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Lin Wen-hsin*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writings of Ku Hung-Ming (1857-1928), an overseas Chinese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British Malaya, and had never been to China until 1885. Ku started his education in England when he was thirteen, and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Western literature. However, according to his perspective, he was a Chinese "by learning." With his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Ku translated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Chung Yung)* and *Analects of Confucius (Lun Yu)* into English. In these texts, he borrowed from Western culture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For example, he quoted the sentences of Bible to explain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called the first student of Confucius "Saint Peter." Also, Ku was widely criticized for supporting autocratic monarchy and polygamy publicly. Considering the distinctive diasporic background of Ku, this study regards his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writings as production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nalyzes the translingual factors in his works.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translingual practices in Ku's works reflec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te Qing history. It was a time when mo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eager to learn Western culture and abandon Chinese tradition, while Ku used the "new" languages to promote the "old" fashion. All of his works were written in English,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Ku was not on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Chinese, but also with the Western readers. By defending Chinese tradition, he identified himself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This study regards Ku's English works as examples of Chinese diasporic texts, and points out the dilemma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faced by Ku, to observe the struggling of an individual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era.

Keywords: Ku Hung-Ming,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ingual practice, national imagination

「再次變成中國人」：論辜鴻銘的雙語寫作與國族想像

林 文 心

一、前言

辜鴻銘（1857-1928）出生於英殖時期馬來亞檳榔嶼的華僑世家，父親祖籍福建，母親則為當地葡萄牙人與馬來人混血。辜氏於十三歲時赴歐求學，數年後獲得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主修為西方文學，並在學成後返至檳榔嶼，任職於殖民政府。在辜氏的生涯座標中，最重大的轉向可說是發生於 1882 年，在新加坡與出使當地的馬建忠相遇，據傳二人相談甚歡，分別以後，辜鴻銘立即向殖民政府辭職，開始學習中文、留辮，並且以英文開始進行一系列的中國實踐，更決心從馬來亞回到中國。¹ 據辜鴻銘之言，馬建忠對他產生極大的影響：「我在新加坡同馬建忠的晤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為正是他——這個馬建忠，使我再一次變成一個中國人。」² 本文以此為題，意圖追問的即是：所謂「變成

¹ 以上辜鴻銘相關之生平資料參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 年）。

² 此段譯文引自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42-43。原文為溫源寧（Wen Yuan Ning）：“My meeting with Ma Chien-chung at Singapore...was a great event in my life. For

一個中國人」應該如何可能？並且，此段話的言下之意，似乎暗示著辜鴻銘曾經有過某種不（夠）中國的時刻。

於此，辜鴻銘海外華人的身份便進入討論。在法律層面上，南洋華人的國籍直到 1955 年，周恩於印尼萬隆簽署《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從此拒絕承認雙重國籍以後，才真正產生問題。³ 然而在跨越地域以後，國族、文化認同的複雜性仍然存在。其中可以留意到，在鴉片戰爭過後，清朝解除海禁，並逐漸留意到海外僑民的存在，1877 年，於新嘉坡設立領事館。蔡佩蓉於《清季駐新嘉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中指出：「海外華民普遍希望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並且認為在 1890 年，新嘉坡領事升為南洋地區總領事館時，讓南洋地區的海外華人對中國（清政府）產生了更為強烈的認同。⁴ 也就是說，研究者已經留意到，於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身處南洋殖民情境下的土生華人普遍出現了一個「再華化（resinization）」的歷程。在這當中，土生華人如辜鴻銘的語言使用值得留意。辜氏出生於英殖時期的中後階段，在生活語言方面，應是以閩南方言、馬來語與英語為主，社交及書寫語言則以英文為大宗，即使將其生長於華僑社群的背景列入考慮，北京官話勢必不會是辜氏的母語。據嚴光輝考察，辜鴻銘的父親辜紫雲說著流利的閩南話，並能使用英語與馬來語；而母親則為當地葡萄牙與馬來人混血，使用語言包含英語、馬來語與葡萄牙語；至於辜鴻銘的出生地檳榔嶼，則為一華僑社區，該地區居民多從中國南部的福建、廣東、海南等地而來，各聚落間使用的是不同的方言。⁵ 可以推斷，就語言層面而言，辜鴻銘既然生長

it was he, —this Ma Chien-chung, who converted and made me become again a Chinaman.”

見溫源寧（Wen Yuan Ning）：“Ku Hung-Ming” *T'ien Hsia Monthly [shanghai]* April 1937, p.387.

³ 鄭文泉：〈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收於鄭文泉編：《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雪蘭莪：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2019 年），頁 158。

⁴ 蔡佩蓉：《清季駐新嘉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25-46。

⁵ 嚴光輝：《辜鴻銘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年），頁 10-11。

於一多元混雜的語言情境當中；若論及文字使用的部分，據辜鴻銘於 13 歲就出國的經驗判斷，其對於「漢文」（中文）的使用想必相當陌生。目前無資料顯示童少時期的辜鴻銘慣於使用何種語言、何種文字，僅能依歷史背景推斷，辜氏生長於一多語混雜的殖民環境，加上年少旅歐的經驗，其所習慣之口頭語言應是混雜了閩南方言、馬來語與英語，而書面文字的使用則應是以英文作為大宗。

基於上述歷史背景對於辜鴻銘的書寫進行考察。辜氏於 1883 年抵達中國，同年，以英文發表〈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一文，內容主要為批評西方漢學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錯誤理解。1885 年，辜氏始任清朝大臣張之洞幕府，職位為洋文案，隨後數十年間，於中國境內不斷地以英文進行創作與翻譯，細考其寫作內容，皆是嘗試為「中國」（China）與「中國文化」（Chinese Culture）進行辯護。中間相繼出版了英譯《論語》（1989）、《中庸》（1906）與《大學》（1915）⁶ 等作，即使是在翻譯領域中，辜鴻銘的對話標的仍然不變，正如其於《論語》的翻譯序中提及：重譯《論語》的目的，便是為了推翻長時間獨尊於西方漢學的雅里各譯本。⁷ 換言之，辜鴻銘書寫的目標群體一直以來都相當明確，他的目光並非看向中國，而是面對西方。需要留意的是，辜鴻銘的首篇作品發表於 1883 年，距其開始正式修習漢文不過一年的時間，在此之前，其所讀過的中國文學不

⁶ 關於辜鴻銘的英譯《大學》一書的出版年份，我目前未見紙本資料，僅有網路資源。推斷紙本資料應是相當難尋，黃興濤便曾指出英譯《中庸》應是完成譯稿，卻未曾公開發行。見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110-114。然而於 2011 年，據學者朱介國考察，英譯《大學》曾於 1925 年上海出版。見朱介國：〈探討辜鴻銘《英譯大學》的「三綱」與「八條目」之知識論傾向〉，《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 22 期（2011 年 4 月），頁 21-40。然而，由於未能獲得此一版本，並且，據《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一書所見，多數學者認定此書出版於 1915 年，並皆引用網站「竹海」的內容，故本文參鄭文泉之說，將辜譯《大學》之出版年份定為 1915 年。參鄭文泉編：《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網站「竹海」：<https://thebamboos.ca.wordpress.com/2012/04/13/ku-hung-ming-higher-education/>

⁷ 清·辜鴻銘著，黃興濤等譯：〈英譯《論語》序〉，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 年），頁 345-347。

過為翟理斯所譯之英版《聊齋誌異》。⁸ 考量此一背景，問題隨之出現：於 1883 年，中國文學、文化，乃至於文字，對於辜鴻銘而言都還相對陌生，那麼他究竟是以何種立場認為自己能夠代表中國、反駁西方漢學？

有趣的是，若考察西方讀者對其著作的回應，便能發覺英語世界對於辜鴻銘的「中國身份」接受得相當快速。本文認為，西方讀者的接受與辜鴻銘一貫的寫作策略息息相關：即便辜氏的著作大量以「中國」為名，然細究其內容，卻是以對西方文學、哲學的討論佔去多數篇幅。相似的做法也同樣出現在翻譯作品之中，已有許多學者指出，辜氏的翻譯策略為歸化（domestication）翻譯，無論是其以西方哲學思想註經，或是有意識地在譯文中刪去中文名詞、比附中西文化等作法，皆已受到許多關注與討論。⁹ 本文認為，更值得關注之處在於，辜鴻銘對於自己的翻譯策略具有一定的意識，他曾多次聲明，這樣的翻譯策略是為了讓西方讀者更方便而快速地接受中國經典。然而，歸化翻譯是否真能達到這種效果？據翻譯學者韋努蒂（Lawrence Venuti）之說，當譯者大程度地消除來源文本的異質性，以創造通順的譯文時，實際上已經是重新塑形了此一文本。¹⁰ 換言之，當辜鴻銘嘗試透過西方文化註釋中國儒經時，譯文中便已經凝鑄了其自身對於西方讀者的歸類以及對於中國文本的想像。

⁸ 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42。

⁹ 除了黃興濤以專書《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辜鴻銘·二：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 年）討論辜鴻銘的生平思想與系列著作以外，亦有針對其翻譯策略進行分析者，單篇論文如王琛發：〈辜鴻銘的《大學》之道：兼論《大學》西譯當中的漢學詮釋與其歷史回顧〉、陳明彪：〈辜鴻銘對於《論語》的詮解：以「辜解」為例〉。以上見鄭文泉編：《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另外，陳煒舜：〈辜鴻銘《論語》譯英文·學而篇譯筆試論〉一文亦以〈學而篇〉為主要分析對象。見《華人文化研究》第 1 卷第 1 期（2013 年 8 月），頁 59-73。金學勤亦著有專書《〈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雅理各、辜鴻銘為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年），針對中西譯者的譯文進行比較。

¹⁰ 〔美〕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頁 11-48。

另一方面，從辜鴻銘的中文著作切入，觀察辜氏曾出版過的三本中文作品，便能發覺，扣除 1908 年出版的中譯英詩《痴漢騎馬歌》後，純然的中文創作僅有《張文襄幕府紀聞》（1910 年）與《讀易草堂文集》（1922 年）二本，出版時間相差了 12 年。¹¹ 此二書無論是在內容或者形式方面，都與辜氏一貫的文學方針產生落差。事實上，身處於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辜鴻銘可謂是相當不合於時代潮流。其對於中國傳統有著不理性的擁護，諸如支持多妻制，並且在清朝正式結束後，強力主張恢復帝制、反對西化等等。在文學理念上，他更激烈地擁護古文、拒絕白話文運動。辜鴻銘不合時宜的復古主張招致當時許多新文化知識份子的批評，與胡適等革新派發生過多次論戰。然而，其所書寫的中文作品，無論是形式體裁、句型、語法，皆與嚴格意義上的古文相距甚遠，而更接近於當時的報章雜誌體。

綜合上述現象，本文以辜鴻銘作為個案，分論其中文、英文翻譯與書寫，並以翻譯作為重心，意圖透過辜鴻銘的翻譯策略，觀察其認同與實踐的落差，更關注其投注於雙語實踐中的國族想像。關於外語文本中所透顯的中國特質，石靜遠（Tsu Jing）於《華人（文）離散的聲音與文字》（*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一書中已有所觸及，如其以〈陳季同的世界文學〉（“Chen Ji-tong’s World Literature”）專章分析了晚清外交官陳季同的法語書寫以及翻譯，探討陳季同的法語書寫如何游移於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並認為張愛玲、哈金等人的英文創作在近代華人離散的情境之下，能夠更進一步地豐富華文文學的討論。¹² 本文承此研究路徑，並嘗試將辜鴻銘海外華人的背景納入討論，進一步將問題複雜化，從文化翻譯的角度出發，重探此時期的歷史複雜性。

¹¹ 以上辜氏作品的出版年份與相關內容皆參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下二冊。

¹² 〔美〕石靜遠（Tsu Jing），*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以「中國」之名：辜鴻銘英文書寫中的國族意識

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正名運動，正式開始於 1883 年。其於《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中以英文連載了〈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一文，該文後來收錄於作品集《春秋大義：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¹³ 文章分作兩個部分，在〈中國學(一)〉之中，辜鴻銘首先羅列了西方漢學從傳教士進入中國至十九世紀末的整體發展，並嚴厲批評目前的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有著根本上的誤會；至於下篇〈中國學(二)〉，則論及中文經典的英譯現況，除了細緻討論關鍵詞如「仁」、「孝」的英譯以外，亦援引諸多西方經典與文學批評作為對照，例如以歌德之語強調研究中國文化應該關注人民的基本價值觀。¹⁴ 整體來說，辜鴻銘在〈中國學〉中展現的關注核心已預示了其於未來中國文化實踐的幾個面向：修正西方漢學，以及進行儒學英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據黃興濤的考證，辜鴻銘本人在發表〈中國學〉之時，甚至從未抵達中國，距離其正式開始修習中文，亦僅有一至二年的時間。¹⁵ 可以思考的是，辜鴻銘此時的中文程度為何？對於文中所提及的中國經典如《孟子》、《論語》等作的了解，又有多少？考其生平，於十三歲時便已赴歐，在英國

¹³ 本書之英文原文參清·辜鴻銘：《春秋大義：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Taipei, Taiwa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r. Ku Hung-ming's Works, 1956.)，於原作中，書名便採取中英夾雜之形式。至於中文譯文則以黃興濤等人編譯之《辜鴻銘文集》為主。

¹⁴ 清·辜鴻銘：〈中國學(二)〉：「德國詩人歌德曾說：『在人的作品中，正如同在自然的造化中一樣，真正值得注意的和超越一切之上的，是意願。』在對民族性格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也是如此。」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125-126。

¹⁵ 黃興濤：〈附錄一·辜鴻銘生平大事年表〉，《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442。

愛丁堡大學中，是以西方文學作為專業。那麼辜鴻銘於文中對中國文學的評價與判斷，其所依據的，除了是童少時期或許曾經有過的家學以外，¹⁶ 便僅能是在 1882 至 1883 年間自行修習而來。在未來的演講中，辜鴻銘更是自陳當時的自己「對於中國的了解反不如對歐洲的了解」。¹⁷ 換言之，在對中國文化、文學仍是生疏的階段裡，辜鴻銘便率先撰文批評西方漢學，更在文中透顯出強烈「代表中國」的態度，其中落差令人玩味。或許可說，無論文中評斷的內容是否真切，其率先透顯的是一種對「國學」的認同與捍衛；此外，仔細考察辜鴻銘的著作與文章，則可以發覺其中許多篇名直指中國，如〈中國婦女〉（“The Chinese Women”）、〈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為了中國的良治〉（“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¹⁸ 等等。然而，辜鴻銘所使用之語言卻以英文為多數，且文中所引用之經典，更多為西方哲學、文學大家。

同時，辜鴻銘的文學養成與實踐版圖更擴及諸多國家：其曾多次赴日演講，演講集隨後被日人翻譯並保存為《辜鴻銘論集》；亦有德人集結翻譯其文章，編成著作《吶喊》，並為之作序。與辜鴻銘相關的資料中，更可見得作家托爾斯泰與辜鴻銘之通信，或是作家毛姆（Maugham W. Somerset）為辜撰寫〈辜鴻銘訪問記〉（〈哲學家〉）¹⁹ 一文等等。故下文以世界文學的角度切入，首先考察辜鴻

¹⁶ 此處的家學僅為推斷，目前關於辜鴻銘的資料中，對於其童少在檳榔嶼的生活皆無完整描繪。故其母語為英語、閩南語、馬來語或者其他混和語言亦難以判別。

¹⁷ 清·辜鴻銘：「由於我青年時代基本上在歐洲度過，因此我剛回國時對中國的了解反不如對歐洲的了解。但非常幸運的是，我回國後不久，就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偉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見氏著：〈什麼是民主〉，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311。據辜鴻銘之生平年表，1882-1883 正是他學成歸國任的期間。

¹⁸ 以「中國」為題，在辜鴻銘的英文原文中，時為 China、時為 Chinese。如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或者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為了中國的良治〉）。然考察此二者之語境，發覺在脈絡使用上相當相近，故本文一律以「中國」譯之。

¹⁹ 上述資料可參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另外，毛姆（Maugham W. Somerset）所傳之文收錄於其著作 *On a Chinese Screen* 中，關於辜鴻銘的篇章原名應為〈哲學家〉。

銘著作中的英文書寫，觀察其中所透顯的「中國成分」，並併以其英文翻譯，考察在其作品中「中國文學」與「世界經典」的關係。

（一）雙邊的世界文學：辜鴻銘中英雙語的關係與互動

石靜遠在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一書中提出「文學治理」（Literary Governance）之說，重探母語與主體的關係，並且強調語言背後所指涉的群體性與國族意涵。²⁰ 蔡建鑫於〈點評石靜遠《華人（文）離散中的聲音與文字》〉一文中，對於「文學治理」有以下解讀：

「文學治理」於是濃縮概括了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文學以及華語語系文學念茲在茲的語言、身分、政治，以及文化的遙譯問題。華語語系研究不僅關注語言、更注意到各種思想、文化、風俗，乃至種族的交流涵化。...

「文學治理」這個概念本身強調：理念到文字、聲音到文字，都是程度不一的翻譯問題。²¹

以此種觀點作為切入，我試圖往下追問的是：語言本身究竟能夠觸及多深層的國族意涵？或者說，「中國性」是否可能透過他語，甚至只能透過他語來進行表

家〉（“The Philosopher”），毛姆在文中並無明確提到辜鴻銘，而考其內容：“He was the greatest authority in China on the Confucian learning. He was said to speak English and German with facility. He had been for many years secretary to one of the Empress Dowager’s greatest viceroys, but lived now in retirement.” 見 *On a Chinese Screen*（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2），pp.137-148。此段落與黃興濤編譯：〈辜鴻銘訪問記〉相同：「他是中國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據說他英文德文都講得很流利。他擔任過慈禧皇太后的一個最大的大臣的秘書許多年，可是現在退休了。」見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594。故〈辜鴻銘訪問記〉一文的篇名應為《辜鴻銘文集》之編者所定。

²⁰ [美] 石靜遠,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²¹ 蔡建鑫：〈點評石靜遠《華人（文）離散中的聲音與文字》〉，《中外文學》第 44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53-162。

述？石靜遠在書中，把對討論陳季同的法文書寫章節命名為〈陳季同的「世界文學」〉，意圖對話的對象為近年來由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學者提出「世界文學」的相關理論。

卡薩諾瓦在專著《文學世界共和國》中，重構了一種觀看文學世界版圖的方式：將構成文學形式的語言視作文學世界的基本貨幣，以及能夠累積文化資本的歷史載體；同時，翻譯則成為關鍵的閱讀方式，並且提供了流通文本、擴張文學世界版圖的功能。²² 然而，就「世界文學」的理論脈絡而言，辜鴻銘的文化實踐或許是個特殊的個案，能夠對此理論進行補充。問題的關鍵仍是在於辜鴻銘的母語問題。即便他的書寫透顯著明確的中國認同，然而其多數文章仍是以英文寫成，並且引用大量西方經典，可以推斷的是：無論是中文還是中國文化，對於辜鴻銘而言皆不夠熟悉。於是，在世界文學思考翻譯的脈絡之下，究竟辜鴻銘的語言跨度是從中文到英文，還是英文到中文？或者，就翻譯理論中對於「本土」／「異域」的角度進行思考，辜鴻銘的文學實踐亦是難以定位。於此，辜鴻銘身為海外華人的背景，便使得其文學版圖比同時代的陳季同還要複雜：母語為中文的陳季同，在面對中國與西方世界這兩個端點時，曾直接地表示應將中國文學翻譯出去，才能夠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爭取一席之地。²³ 而陳季同於1889年將《聊齋誌異》翻譯為法文，更可以視為其文化推廣的具體實踐；相較於此，辜鴻銘於1898年翻譯《論語》、1904到05年翻譯《中庸》，乃至於1915年才出現的《大學》，都同樣是將中國文化輸出西方，並且意圖「引起（英文讀者）對中國人現有成見的反思，不僅修正謬見，而且改變對於中國無論是個人、

²² 〔法〕巴斯卡·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著，羅國祥譯：《文學世界共和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²³ 清·曾樸：〈曾先生答書〉，收錄於《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第4冊，卷8，頁1125-1139。

還是國際交往的態度。」²⁴ 然而觀察其系列著作，卻會發覺辜鴻銘所書寫之內容與其具體實踐的衝突之處。

辜鴻銘在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態度，顯得游移不定：讀者首先可以察覺他對於中國文化不理性的認同，甚至經常在行文中透顯出一種「凡中皆好」的態度。例如他擁護極權主義，而認為歐洲若要出現一個好的霸主（Czar），應該要效法秦始皇坑儒那般殺盡亂源。²⁵ 其表面上展現出一文化捍衛者的姿態，不斷以中國經典、歷史、文化訓示西方讀者，更曾經指出：「要和平解決目前的中國問題，唯一可能的方式在於改革，但不是中國的改革，而是歐洲的改革，是大英帝國迫切的改革。」²⁶ 足見其面向西方時表現出強烈的中國本位。然而細考其作，雖主體總是明確地代表著中國，但在敘事策略方面，卻總是頻繁地挪用西方文學作為論述憑證。舉例而言，在〈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統治與文明的考察〉（“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中，辜鴻銘將全文分作五個部分，分別為〈之一：一般情形〉（“In General”）、〈之二：在英國〉（“In Great Britain”）、〈之三：在德國〉（“In Germany”）、〈之四：在法國〉（“In France”）與〈之五：在美國〉（“I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²⁷。此

²⁴ 清·辜鴻銘：〈英譯《論語》·序〉，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346-347。

²⁵ 清·辜鴻銘：「兩千年以前，中國的一個極權皇帝曾活埋了四百個稱之為『儒士』的亂臣，給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和平。這些儒士都是編輯蠱惑人心之書的老手。現在歐洲的霸主企圖通過海牙會議給世界帶來和平，卻以失敗告終了。下一個想要繼位的歐洲霸主，看來必須採用中國古代極權皇帝的辦法不可。」見氏著：〈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統治與文明的考察·之一：一般情形〉，收於黃興濤等編：《辜鴻銘文集·上》，頁83。

²⁶ 清·辜鴻銘：〈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統治與文明的考察·之二：在英國〉，收於黃興濤等編：《辜鴻銘文集·上》，頁97。

²⁷ 本文之中文譯文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75-168，英文原文則參辜鴻銘，*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Shanghai: Mercury, LTD. 1901），pp.85-174。

文首次發表於 1900 年，從其篇名便可發覺辜鴻銘面對世界的中國立場。此外，本文為隨筆札記形式之社論，在每部分之起始皆附有一箴言（*motto*），五個部分分別為賀拉斯古詩（拉丁文）、古諺（拉丁文）、歌德語（德文）、伏爾泰語（法文），以及愛默森語（英文），行文之間更不時出現德、法語引文，此一作法，使得辜氏的作品成為了一種多語混雜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文中多語交混，並且引用了諸多西方文學、哲學的典故，然而相較之下，中國文化、經典的比例卻明顯偏低，幾乎沒有孔孟以外的人物出現，甚至在許多部份中，與中國文化／文學相關內容要到文章後半部份才出現。換言之，此文之篇名雖謂之曰「中國問題」，具體內容卻是「西方問題」，其中明顯的文化失衡，令人玩味。

同時，辜鴻銘的社論與政論頗能被視為其翻譯作品的前身，由於文中偶有引用孔子語，在稍晚，即成為他英譯《論語》的底本。其書寫中的語言問題頗值得觀察，首先要留意到的是，以西方文學為專業的辜鴻銘，對於「通俗英文」與「古英文」之間的差異有著充分的把握。當針對白話文運動進行反駁時，他便於〈反對中國文學革命〉（“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為了強調「中國文言是高雅的」，並特地將莎士比亞的古英文詩以通俗英文進行重寫，比較二者間的差異以作為證據。²⁸ 此處可以發覺，辜鴻銘對於英文文體的古今、雅俗有所研究。然在辜氏的英文作品當中，一切引文多被事先翻譯為流利的現代英文，如《論語》：「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²⁹ 一句，辜氏之譯文為：“A Person who tries to put on the air of a strong and proud man, but who in reality is a weakling and coward at heart – is he not like one of your mean,

²⁸ 英文全文見 1919 年 7 月 12 日《密勒士評論報》（*Millard's Review*），收於《密勒士評論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中文譯文則見於黃興濤等編譯：〈反對中國文學革命〉，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165-170。

²⁹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692。

smell men? Yea, is he not like a cowardly thief or a sneaking pickpocket?”³⁰ 譯文首先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一句拆解成兩部分的問句，並且進一步出現人稱（he、your 等）的分別，或許可說，在翻譯策略上，辜氏並非選擇古英文，而是透過現代英語中的語言規則，填補了文言文中許多空白的部分。

反觀辜鴻銘僅有的兩部中文作品《張文襄幕府紀聞》、《讀易草堂文集》，此二本書之文體雖非嚴格意義的古文，卻也顯然不是白話文。此處即可發覺辜鴻銘在進行翻譯時，在中國文化本身，以及翻譯的雙邊語言之間，出現了古今時差：辜氏熟知古典英文、拉丁文等「舊式」英語，而選擇將中文古典作品譯為流利的「現代」英語，且其英文創作皆非古英語；然而若反過來觀察辜氏面對中文的態度，則會發覺他堅持一切創作必須以古典文言進行表達。其中雙邊的語言文體所反應出的時差似乎並未被他自己本人留意到，在辜鴻銘的相關文論中亦不見說明。然可以發覺的是，辜鴻銘對於「中國」的認同及想像，已經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時代潮流產生落差；此外，他熟悉世界文學經典，並使用流利的「當代」英文、援引相關英語作品來捍衛自己心中的「舊式」中國。就辜鴻銘自身的思想體系而言，中文世界與英語世界顯然亦有其時差，甚至可說，其所捍衛的，實是一種被本質化的「想像中國」，而這樣的現象，或許也可視為辜鴻銘掙扎於語言文化與國族認同之間的隱喻。

有趣的是，辜鴻銘確實在國際上成功累積出聲望，據英國作家毛姆之文，拜訪辜鴻銘是吸引他前往北平的最大誘因之一。³¹ 而德譯《吶喊》與日譯《辜鴻銘論集》中，皆附有譯者序言，在此二書中，二位國籍不同的譯者，皆不約而同提到了辜鴻銘對於本地文化的影響：

³⁰ 清·辜鴻銘，*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Shanghai: Mercury, LTD. 1901），p.97.

³¹ Maugham, W. Somerset, “The Philosopher,” pp.137-148.

（德）《吶喊》譯者〈前言〉：

如果我們耐心傾聽這位歐洲尤其是德國人民的真正的和正直的朋友，這位「歐洲人」辜鴻銘從遙遠的東方奉送給我們的建議。我們也會做得更好。讓我們來認真地檢視一下辜鴻銘先生給我們指出的這條道路，是否是拯救我們於目前困境的道路？是否是引導我們通向幸福平安的唯一道路？³²

（日）《辜鴻銘論集》譯者〈序〉：

辜鴻銘先生是近來訪日的中國學者中，最能贏得國人好感，且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直到現在，無論廣播演講還是論及中國的著述，都經常引用辜鴻銘先生的逸事及其觀點。……被喻為東方巴納德·肖爾的辜先生曾獨領中國論壇，甚至有人說：你可以不去參觀紫禁城，但一定要去敲辜鴻銘的大門。³³

透過上述異國讀者對辜鴻銘的回應，能夠發覺辜鴻銘在國際間作為一個「中國代表」實已獲得一定程度的迴響。於此，代表中國的辜鴻銘實是被本質化為一種東方印象，弔詭的是，這一東方形象之能夠被成功塑造，關鍵卻是在於其對於西方文化的熟悉。德國譯者奈爾遜將辜氏稱為「歐洲人」，並直謂其「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卡萊爾、愛默生和別的盎格魯薩克遜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魯薩克遜人」、「通曉《聖經》就像一位最好的基督徒。」³⁴或許可說，對於西方文化的熟悉成為辜鴻銘的一張通行證，使其揮舞著自身的中國認同遊走於國際

³² 〔德〕亨利希·奈爾遜著，黃興濤等譯：《吶喊·譯者前言》，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487-490。

³³ 〔日〕薩摩雄次著，黃興濤等譯：《辜鴻銘論集·序》，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269-270。

³⁴ 〔德〕亨利希·奈爾遜著，黃興濤等譯：《吶喊·譯者前言》，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487。

間。總結而言，辜鴻銘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狂熱或可溯源自其長久以來的離散背景，境外華人對於「根」的想像與懷舊。當石靜遠論及「文學治理」，提醒我們在關注翻譯時，必須留心存在於文字與文化背後的權力階級。而在辜鴻銘的案例中，透過其英語書寫，中國社會與文化已然發生變形，被鑄造以辜氏的中心想像與政治狂熱；換言之，當新舊之交與華夷之辯在辜鴻銘身上同時發生時，其所受過的西方新式教育，竟然成為回歸東方傳統的強力武器。

因此，我認為辜鴻銘的個案能夠對「世界文學」進行補充的原因即在於：在卡薩諾瓦在《文學世界共和國》一書中，肯認語言有強、弱勢之分，並且將一部分的弱勢語言使用者稱為「被同化者」，認為他們會處於一種「怪異和不安全的狀態下」，因為這樣的狀態，他們往往會「像糾正『口音』那樣，改正和消除自身語言學的痕跡，結果卻顯得有些矯枉過正。」³⁵ 卡薩諾瓦對於「被同化者」的描述乍看之下相當貼合於辜鴻銘對於中文的態度，然而必須注意，在此著作中，卡薩諾瓦將漢語（中文）定位於弱勢語言（或「小語言」，即 *minor language*）。³⁶ 並且翻譯之所以對於世界文學極其重要，關鍵在於其能夠促進文學空間的聚合，而辜鴻銘在各國之間所獲得的回應，乍看之下似乎承接著卡薩諾瓦對於世界文學的想像，然而辜氏無論是創作或者翻譯的實踐，皆複製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權力，正如石靜遠對於此一理論的批評，世界文學背後有其歐洲／西方中心主義，當辜鴻銘嘗試從英文跨度到中文的時候，變成為此一理論之反例。

（二）文化身份再造：英譯《論語》、《中庸》的翻譯策略

上文留意到，在辜鴻銘以「中國」為名的諸多社論中，其實展現出文化的多元交織，並且辜氏透過此種書寫策略，在國際間開展出個人的政治版圖。同時，

³⁵ 〔法〕卡薩諾瓦著，羅國祥譯：《文學世界共和國》，頁 295。

³⁶ 同前註，頁 296。

在其著作當中，無論是將法、德引文在註腳以英文進行補充，還是將孔孟學說在論述間翻作英文，皆已屬於語言的跨度。而在發表並出版一系列批評時政、推廣中國文化的英文文章後，辜鴻銘更進一步地就中國經典論著進行翻譯。於 1898 年出版了《論語》英譯本，並且於 1904 至 1905 年於《日本郵政》連載《中庸》英譯，及後人考察出版於 1915 的《大學》英譯。故下文擬聚焦於辜鴻銘的譯作開展討論。關於翻譯研究，譯者兼翻譯學者韋努蒂在《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一書中沿用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對於語言的主張，認為「任何語言的使用，都是諸種權力關係的場所，因為在任何歷史時刻，語言都是由佔據主導地位的標準方言支配其他地區方言變體」，在這樣概念之下，來源語與目的語之間難以跨越的差異，即被稱之為「語言剩餘」（remainder）。³⁷ 也就是說，語言背後的文化權力在翻譯的異質性中變得明顯，捕捉翻譯中的「語言剩餘」，則能夠發覺譯者如何夠過譯文重塑來源文本的文化身份。故針對辜鴻銘具體的翻譯實踐進行討論，著重於中國文化／文本的詮釋與再現，觀察其面向西方所塑造的文化身份，以及其譯作又是如何進一步地透露出辜氏對於中國的道德想像。

據黃興濤之整理，辜譯經典採取意譯的翻譯策略，用語自然流暢，並且能以「有機整體」的方式使得儒學思想完整呈現。同時，「辜氏的翻譯積極為西方讀者，尤其是為一般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著想，追求其對儒家經文的理解乃至對經義的認同。在這方面，他最重要的努力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和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註釋有關經文。這在儒經註釋史上，可謂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³⁸ 確實，辜氏援引西方哲學、文學以釋儒經，是其譯作一難以忽視的特色。在現有的英譯儒經中，援引西方哲學作為解釋者並不

³⁷ 〔美〕韋努蒂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頁 13-18。

³⁸ 上述關於黃興濤之研究整理參〈英譯儒經：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嘗試〉，收於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107-144。

多見，然而我們已經發現，於論述間調度中西文化的書寫策略，卻在辜鴻銘的系列著作中相當普遍。更準確言之，辜鴻銘的譯作即是其過往文論的延伸，於是其在書中的註釋，除了如黃興濤所言，援引大量西方作家以外，更持續地批評西方漢學家如里雅各（James Legge）等人。同時，以書中譯注作為觀察對象的話，更會發覺辜鴻銘於其中已然展開出世界文學的版圖。不僅帶入西方作家名言，同時也援引聖詩（Psalm）、聖經（Bible）等經典，甚至曾在註釋中將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相互對照。³⁹

不僅追求文字的對照，辜鴻銘也努力地在譯作中創造文化對等性（cultural equivalence），如將《詩經》翻譯作「民謠與聖詩之書」（The book of Ballads Songs and Psalms），並且於此標題後註釋：「如今被稱為『詩歌正典』，被收錄於中國的聖經——俗稱『五經』的其中之一」⁴⁰。就此處而言，顯然是在黃興濤所謂的「意譯」之上，尋求更進一步的對照，故將「五經」比喻為「中國的聖經」。又或者，在文中提及顏回（Yen Hui）時，註釋寫到：

孔子門徒中的聖約翰——一位純真、英勇的理想人物，備受大師的喜愛。

因為這位弟子在全書中非常頻繁的出現，我們將他從消去所有中文名字
的規則中獨立出來，此後也都會以他的名字來稱呼他。⁴¹

³⁹ 對聖詩的引用可參清·辜鴻銘著：《茲在文斯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8），p.3.對於日本文化的說明與比較則參同書中頁5。

⁴⁰ 引句為我所試譯，參考原文：「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s, in the Bible of China。」見清·辜鴻銘：《茲在文斯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p7.

⁴¹ 引文為我所試譯，參考原文：“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 --a pure, hero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 As the name of this disciple occurs very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book, we here depart from our rule of eliminating all Chinese proper names, and shall hereafter always introduce him by name.” 見清·辜鴻銘：《斯文在茲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p9.

辜鴻銘將顏回稱之為「孔子門徒中的聖約翰」令人莞爾，約翰相傳為受到上帝喜愛的一位門徒，辜鴻銘亦因顏回受到孔子的喜愛而如此稱呼他，顯然在中西文化中，他找到了一組相似的形象譬喻。透過上述例子，可見出辜鴻銘為了顧全西方讀者的理解，不斷於中西文本中尋找、乃至於創造「相似性」。換言之，此處的做法便近似韋努蒂翻譯理論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其大程度地消除來源文本的異質性、創造通順的譯文。同時，文中提其「消去所有中文名字的規則」乃出自於英譯《論語》的翻譯序，於此篇序文中，辜鴻銘詳細地說明自己的翻譯策略與苦心，為了顧全西方讀者的理解，甚至進一步地吸引更多讀者，而對譯本進行部分的調度：

我們努力讓孔子與他的弟子像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那樣說話，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中國賢人曾經表達過的相同思想。此外，為了盡可能地消除英文讀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能，我們便去掉所有中文名字。最後，為了希望讀者能理解文本中的重要思想，我們添加了非常著名的歐洲作家的話當作註釋。徵引這一連串已經被熟悉的思想，或許能夠吸引認識這些作家的讀者們。⁴²

⁴² 引文為我所試譯，參考原文：“We have tried to make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speak in the same way as an educated Englishman would speak had he to express the same thoughts which the Chinese worthies had to express. In order further to take away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sense of strangeness and peculiarity for the English readers, we have, whenever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eliminated all Chinese proper names. Lastly, with the hope of bringing home, so to spea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 text, we have added as notes quotations from well known European authors, which, by calling up the train of thought already familiar, may perhaps appeal to readers acquainted with those authors.” 見清·辜鴻銘：《斯文在茲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p. viii。又，於黃興濤編譯之《辜鴻銘文集·下》中，雖同樣附有中文譯文（頁 345-347），然在語句表達方面，我認為稍有未盡之處，故在參考之後重新譯之。

在此段譯序中，辜鴻銘解釋了自己在翻譯時的顧慮，進而顯現出其游移於多重語言、思想與認同之間的矛盾處境，更可看出他如何以譯者身份，塑造出「中國經典」的「西方形象」。

首先討論形式的問題。辜氏意圖讓孔子與其弟子「像受過教育的英國人那樣說話」(“speak in the same way as an educated Englishman would speak”)，點明「受過教育的」即暗示出有相對「未受過教育的」，於是他彷彿暗示著：「中國賢人的思想」可以透過一種「未受過教育」的方式來表達。若不細究此處用語背後的指涉，拉大範圍而言之，當辜鴻銘宣稱自己是為了讓西方讀者能夠不感到「陌生與奇怪」地理解文本，而隱去了「中文名字」時，便必然留意到了在語際轉換之時的文化差異，同時也發覺了譯者在翻譯時所能調度的修辭空間。正如黃興濤所指出，辜鴻銘的翻譯貼近英文、通順且清晰易懂，然而這樣的「歸化翻譯」，在韋努蒂的觀點中，卻是對目的語的服從：「流暢的翻譯也許能夠使異域文本獲得更多的讀者，哪怕這個文本受到自己文化的排斥，並且會重塑意義非凡的經典。但是這樣的翻譯同時強化了主要語言，支持了其對不同語言和文化差異的排外，同時又掩飾了國內價值觀的銘刻。」⁴³ 換句話說，這樣的翻譯策略事實上是對於意義的重塑，更放大了目的語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權力。於此我們便能見出辜鴻銘的翻譯實踐與其政治理想之間的矛盾：他不斷讚頌中國文化、聲稱西方國家應該效法中國，從教育、政治等面向進行改革；⁴⁴ 然而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他卻採取了歸化翻譯的策略，有意識地消除文本的異質性，凹折中文經典以附會西方文化。

或許辜鴻銘自己也意識到其中的矛盾，故數年後在出版英譯《中庸》時，他對自己的翻譯標準有了再一次的說明：

⁴³ [美] 韋努蒂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頁 17。

⁴⁴ 黃興濤：〈中國文明優位論〉，《辜鴻銘·二：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頁 153-161。

我還無法讓另一本譯作（此指英譯《大學》）到達我滿意的翻譯標準，我所謂的標準，是在完全掌握了意義之後，不僅能夠再現內容中的事件（matter），還要再現文本原來的規矩（manner）。因為就像 Wordsworth 談到文學真正的內在價值所說：「規矩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事件總是會出現在規矩之前。」不過要能夠帶出偉大而睿智的古人的寫作規矩——或在文學中稱之為風格——我們必須試著讓自己獲得他們的智慧，而這在這個「進步文明」的現代世界中，是很不容易的。⁴⁵

於此可以發覺辜鴻銘在英譯《論語》與英譯《中庸》的轉變。在英譯《論語》中，他曾經直接於註腳承認看不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一句。⁴⁶ 然而至英譯《中庸》之時，顯然「完全地掌握意義」已經成為翻譯的前提。並且，在討論 matter 與 manner 的段落中，辜氏也明顯意識到內容與形式的差別，其所謂 manner 直指形式，或許也讓人聯想到文本的文體與風格問題。然而，要如何以英文——尤其是流利的現代英文——來再現儒學中的文言風格呢？英譯《中庸》與英譯《論語》出版年份相差八年，據辜鴻銘之言，英譯《中庸》應是符合其所訂下的翻譯標準，言下之意，英譯《中庸》保存了原文中的形式（original manner）。然細考其中譯文風格與翻譯策略，則會發現辜鴻銘仍是採取挪用西方經典以註經

⁴⁵ 引文為我所試譯參考黃興濤之譯文（《辜鴻銘文集》，頁 509）後再譯，參考原文：“Bu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bring my translation of the other book into a shape to satisfy the standard at which I aim. My object, after I have thoroughly mastered the meaning, is not only to reproduce the matter, but also the manner of the original. For, as Wordsworth says of all literature of really intrinsic value: “To be sure, it is the manner, but the matter always comes out of the manner.” But to be able to comes out of the manner—what in literature is called the style—of the great and wise men of the past, one must try to put oneself attained—a thing one finds not easy, living in this modern world of the “civilization of progress.” 見清·辜鴻銘：《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p9.

⁴⁶ 清·辜鴻銘：《斯文在茲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p15.

的方式，在語言使用上也同樣以淺白、通順的英文為主。換言之，在八年後第二次的儒學翻譯當中，辜鴻銘的宣告與其實踐仍然出現落差。

透過觀察辜鴻銘的翻譯實踐，可以發覺其所採取的歸化策略，使得英譯《論語》與英譯《中庸》被囊括到西方文學與文化的論述體系之中，異質性的消除使得西方讀者能夠輕易地接受辜鴻銘的譯作，換言之，辜鴻銘的譯本實際上重塑了中國經典在西方的文化身份，正如韋努蒂指出：「翻譯建構出異域文本、異域文化的本土再現，同時還建構出一個本土主體（domestic subject），這是一個可理解的立場，一個具有意識形態的立場，並滲透著特定本土社群的行為準則及經典、利益和日程。」⁴⁷ 透過這樣的觀點看來，辜鴻銘對於中文經典的翻譯，除了其所宣稱的文化推廣之目的以外，更深層的作用在於，建構出自身於西方世界的東方形象，換句話說，辜鴻銘不僅透過翻譯重新建構了《四書》的文學形象，所謂「異域文化的本土主體」，即是其配合著西方文化的標準下，對於自身「代表中國」的形象重塑。

三、回到祖國、回到母語：辜鴻銘的中文書寫與新舊辯證

辜鴻銘畢生僅出版過三部中文作品，分別為 1910 年的《張文襄幕府紀聞》以及 1922 年由羅振玉代選編成的《讀易草堂文集》，於後者中收有〈意大利國賢妃傳〉為義大利古文詩歌的中譯本；商務出版社則在 1908 年前將辜鴻銘譯自英國詩人科伯（William Cowper）的敘事長詩《痴漢騎馬歌》出版。相較於辜鴻銘的系列著作，中文的比例顯然偏低。關於辜氏的中文程度，就其出生背景而

⁴⁷ [美] 韋努蒂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頁 106。

言，於十九世紀末出生於馬來亞的土生華人多數母語應為英文或者閩系方言，⁴⁸而陳其華於 1934 年發表於《人間世》的文章〈我所知道的辜鴻銘先生〉，便提及辜鴻銘在書寫中文時的不熟練：「辜先生英文造詣極深，當他拿起筆寫英文信時，一揮即就，可是中文的字體不十分好……我曾親眼看見他寫的『求己』二字，初看時，我不相信是他寫的，他自己署名的那個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離約摸有二三分闊，誰相信這是鼎鼎大名的辜鴻銘寫的呢？」⁴⁹故粗略推斷，即便辜氏生長於華人社區，考其生平與著作，中文寫作對他而言應該仍是相對陌生。

於是此處便出現了國族認同與國族語言的斷裂。辜鴻銘在許多著作中皆自稱中國人，而 1926 年芥川龍之介曾誤將辜鴻銘出生地寫為福建：「先生南則生於福建，西則學於蘇格蘭的愛丁堡，東即娶於日本，北則居於北京，故字號為『東西南北人』。」⁵⁰此處無法考證芥川龍之介是誤記，還是時人對辜鴻銘的認識皆是如此。然而目前學界與辜鴻銘相關的研究中，儘管多已留意到辜鴻銘境外華人的身份，卻也多將辜鴻銘視為「中國人」；本文無意挑戰辜鴻銘的自我認同，僅是試圖指出，其認同與母語之間出現的斷裂。據溫源寧(Wen Yuan-Ning)之文，辜鴻銘在遇見馬建忠以前，所有中國文學僅讀過翟理斯翻譯的《聊齋誌異》，而遇見馬建忠後，使得辜鴻銘「再一次變成一個中國人」。⁵¹此處則出現一弔詭在於：一位中國人要如何「再次變成中國人」？而辜鴻銘在遇見馬建忠後甫始學習漢文，然而就其作品觀之，其對於中國語言與文學的態度卻始終忽近忽遠，難以定位。

⁴⁸ 此一推斷參考王琛發：〈辜鴻銘的《大學》之道：兼論《大學》西譯當中的漢學詮釋與其歷史回顧〉，收於鄭文泉編：《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頁 13-20。

⁴⁹ 陳其華著：〈我所認識的辜鴻銘先生〉，《人間世（辜鴻銘特輯）》第 12 期（1934 年 9 月），頁 45-46。

⁵⁰ 〔日〕芥川龍之介著，夏丐尊譯：〈芥川龍之介氏的中國觀・辜鴻銘氏〉，《晨報副刊》，1926 年 6 月 12 日，頁 27-28。

⁵¹ 溫源寧(Wen Yuan-Ning)，"Ku Hung-Ming," *T'ien Hsia Monthly [shanghai]* April 1937, pp.386-390.

故於下文的討論中，將範圍聚焦於辜氏的中文書寫及翻譯，於此可以思考的問題是：對於母語非中文者而言，書寫中文是否能夠稱作「翻譯」？又，辜氏於十九世紀末抵達中國、活躍於二十世紀初，此時期適逢中國文人正大量引進西方學術思潮，並且興起文學改良與革命的階段。辜鴻銘於 1915 年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講授英詩與拉丁文，卻在課堂上鼓吹春秋名份大義。⁵² 與中國整體知識圈不斷提倡的新文化思潮相對立，更與整體時代風氣相違，其中的問題不僅牽涉了華夷之分，更包涵了新舊文化的角力。

（一）前往中文：傳統與革新、書寫與翻譯

目前學界對於辜鴻銘中文創作的討論，大多與其留髮辮、支持多妻制、捍衛清政府等作為聯合觀之，並放置於清末遺老的脈絡下，較少針對其中文書寫單獨討論。⁵³ 考察辜鴻銘的寫作年表，可以發覺中文作品僅是少數，最初是將英國詩人科伯的長詩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譯作中文《痴漢騎馬歌》⁵⁴，此作的翻譯策略在某種程度上與英譯《論語》、《中庸》接近，如殷麗即於〈辜鴻銘漢譯英詩中的歸化翻譯——以《痴漢騎馬歌》為例〉中分析辜氏於此作中採取的歸化策略，其指出辜鴻銘隱匿原文本中出現的地名、人物名，主角 John Gilpin 僅譯為「富翁」、「君」；其妻亦刪去姓名，僅譯為「良婦」；而除了開篇點出「倫敦城」以外，其他英國地名皆在譯文中刪去。更令人莞爾的是，原文本中的女僕 Betty 於譯本中被改名為「秋香」，殷麗認為辜鴻銘嫁接了中國民間典故〈唐伯虎

⁵² 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448。

⁵³ 除了黃興濤的專著將辜鴻銘對於復古舉動視為對清朝的認同以外，王雷：《民國初年前清遺老群體心態剖析》（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社會文化與旅遊學院碩士論文，2000 年）亦將辜鴻銘對文言文的捍衛放置於清遺老的脈絡之下。

⁵⁴ [英]科伯(William Cowper)著，清·辜鴻銘譯：《痴漢騎馬歌》(Taipei, Taiwa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r.Ku Hung-ming's Works, 1956.)

點秋香〉或〈三笑姻緣〉中的聰明伶俐的婢女形象，使中文讀者輕鬆進入文本語境。⁵⁵

而值得注意的是譯文的文體，《痴漢騎馬歌》全篇以五言詩之形式寫成，四句一組，韻腳幾乎每段皆換韻，且其中一二四行押韻、二四行押韻、一四行押韻等情形皆可見，如：

第 1 節

習有富家翁，饒財且有名，身為團練長，家居倫敦城。（一二四行韻）

第 3 節

明日是良辰，城外好風景，願乘雙馬車，與君同遊聘。（一四行韻）

第 5 節

富翁對婦言，相敬既如賓，若不從汝言，相愛豈是真。（一三行韻、二四行韻）

目前學界多數皆認為，由於其五言詩體與自由換韻，故辜鴻銘是以樂府古詩之文體為此詩進行翻譯，因此將其視為翻譯理論中的「歸化翻譯」。⁵⁶ 辜鴻銘在操作此詩翻譯時，對於語言的使用確實做出調動，然而可留意是理論的架構是否適切。韋努蒂在提出歸化與異化翻譯的說法時，實是為了觀察翻譯語言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距離，於是在《翻譯之恥》一書中，討論到林紓與嚴復的翻譯時，認為「他們的譯作，更加忠實的是文言，而非西方的觀念或形式。」然而在此一時代的社會風氣與政治運作之下，「指導著嚴林譯作的本土文化政治議程，並沒有完全消除域外作品的差異。相反，歸化的內驅力也傾向將西方不同的觀念與形式引介到中國……其結果是，古代中國文化與西方價值觀常常並置相較，

⁵⁵ 殷麗著：〈辜鴻銘漢譯英詩中的歸化翻譯——以《痴漢騎馬歌》為例〉，《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2 期（2014 年 4 月），頁 242-245。

⁵⁶ 除了殷麗外，馬飛、顧發良：〈靈活對等、辭氣相副：《痴漢騎馬歌》意譯法西論〉一文中，便從體裁、韻腳、語體三個方面切入，析論此作對於中國古詩文體的挪用與轉化。見《富洋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5 期（總第 149 期），頁 59-61。

而二者都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這一將異域作品歸化為本土主導形式的翻譯實踐，既帶來中國本土的效果，又帶來西方異質的效果。」⁵⁷ 從嚴復、林紓的例子觀之，須留意的是中國的書寫語言在晚清民初時正經歷劇烈變革，於是所謂的歸化於目的語的翻譯策略，在此時期並無法完全有效地達到使來源文化隱形的功能。正如林紓的文言譯文無意間推動了西方文學的引入，將新詞彙帶入中國；我們同樣能夠發現《痴漢騎馬歌》中不符押韻格律的部分，如文中亦有出現毫無押韻的段落：

第 4 節

阿姨與其女，妾偕三小兒，一家盈車載，君當騎馬隨。⁵⁸

換言之，辜鴻銘或許有意識地嘗試以帶有古詩風格的文體翻譯此首長詩，然而此篇原作為十八世紀浪漫主義風格之敘事長詩，其篇幅多達 63 節，即使是對於形式篇幅限制較為自由的樂府古詩，亦不常見，故辜氏此篇譯作是否能夠被稱之為樂府體尚且有待考察。相似的個案還有同時期文人林紓於 1898 年出版的《閩中新樂府》，其標題雖直稱「樂府」，「新」字亦暗示著詩體的變化，考其作品，則可發覺雖然同樣押韻，卻無論是在用詞與字句數方面，與樂府詩體出現分歧，如〈十年不結婚〉一詩，有「十年不結婚，十年不與男子言陰陽。／下了絕交書，汝自做乾我做坤。」等句。⁵⁹ 從此書中可以看出，雖然林紓仍嘗試以古體風格作詩，卻在西學的影響之下使得文體出現變化，而胡適隨後更直稱林紓此系列的作品為「白話詩」⁶⁰。當然，林紓與辜鴻銘面對文學改良的態度頗有差異，本文亦無意將二人的作品並列比較，而是試圖指出，在晚清時期，中國文人

⁵⁷ 〔美〕韋努蒂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頁 280-283。

⁵⁸ 以上引文皆見〔英〕科伯著，清·辜鴻銘譯：《痴漢騎馬歌》，頁 1-2。

⁵⁹ 林紓著，李家麒等編：《林紓詩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175。

⁶⁰ 胡適：〈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晨報六週年增刊》第 12 月期（1924 年 12 月），267 頁。

與西方文學互動頻繁的時代氛圍下，即便辜鴻銘嘗試「回到古體」，都仍透顯出其中語言文體的流動變化。

同時，辜鴻銘與中文的漸進關係在其後二本作品中更為明顯，據考查，章太炎（1869-1936）與錢恂（1853-1927）皆曾對辜鴻銘之中文程度進行過批評；⁶¹然而，辜鴻銘反對白話文與文學改革，強調中國文言「高雅」，必不可能以白話進行中文寫作。在其出版於1910年的首本中文著作《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辜氏中文書寫的不穩定表現得相當清楚。此作由七十二篇短文所組成，細讀其中內容，則可發覺，《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個篇篇幅短小之餘，用字造句的文法上亦與古文頗有歧出，文中更可見出許多新詞。如〈亡八蛋〉一篇之全文：

學部侍郎喬君謂余曰：「君所發議論，皆是王道。其如不行於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⁶²

此作不僅未達百字，文中所謂「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更是通俗口語，事實上，辜鴻銘在《張文襄幕府紀聞》的多篇作品中，皆不避諱將俗語入文。如〈倒馬桶〉中論及學問，說「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賤種〉一文中直罵袁世凱為「賤種」、〈不吹牛屁〉直指：「中國之亡，不亡於實業，不亡於外交，而實亡於中國督府之好吹牛屁也」、〈爛報紙〉不合理地擁護秦王焚書坑儒：「余以為當日秦始皇所焚之書，即今日之爛報紙，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爛報紙之主

⁶¹ 如錢恂謂：「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國文，太不知中國理……是直外國人而已矣，何用哉？」見錢恂致汪康年書信，收於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3冊，頁2977。或章太炎曾曰：「湯生，英文，他好，國學他根本不（行）……」見香黎庵著：〈憶昔專訪章太炎〉，《春秋》第6卷第5期（臺北：春秋雜誌社，1967年）。

⁶² 清·辜鴻銘：〈亡八蛋〉，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432。

筆也。勢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甚至於〈馬路〉一篇中，所紀錄的對話相當俚俗：

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馬路上馳馬，忽於人叢中沖倒一老嫗，幾斃命，行路人皆為不平，道台之子停馬鞭指而罵曰：「撫臺築此路，本要給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馬路，你們混帳百姓，敢占了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懲辦已算你們造化，還敢同我理論呢。」有一鄉人回應：「哎呦，大少爺！如此說來，如今中國為有官同馬有路走，我們百姓都沒有路走了。」⁶³

從以上例子可以發覺，辜鴻銘的中文書寫在 1910 以前，僅能以相當口頭的方式呈現，整體而言，或與當時的報章新聞體較為接近，以這樣的作品捍衛古文，故引來章太炎等國學大師的批評。

到了 1922 年出版的《讀易草堂文集》中，文章篇幅已然大幅增長，語言使用方面，亦不再有如《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大量充斥的口頭語，並且抽象的議論內容亦明顯增加，其對於中文、古文的掌握有著清楚可見的進步。此書由羅振玉選編而成，其中〈《尊王篇》釋疑解禍論〉與〈義利辨〉二篇，皆是辜氏自行改譯自早年發表的英文作品。若說辜鴻銘早期的作品是代表中國而面向西方讀者、並且不斷呼籲西方政權改變對中國輕視的態度；則此時將此類作品改譯為中文，目的又是為何？就內容而言，辜鴻銘於中文作品中的論述重心有些許轉移，更側重於呼籲中國人不必一味仿效西人，如：「一種少年浮躁好事之輩，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逢朝廷急思改弦易撤之秋，謬襲西人唾餘，紛陳條議，冀緣捷徑以干榮利。」⁶⁴ 等相似的說法頻繁出，可以看出辜鴻銘明確的意識到

⁶³ 引文皆參考《辜鴻銘文集·上》，分為頁 433、頁 434、頁 438、頁 447、頁 440。

⁶⁴ 清·辜鴻銘著：〈《尊王篇》釋疑解禍論〉，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223。

讀者的差異。然而，仔細比較 1900 年 7 月所發表之〈我們願為君王死去，皇太后啊！關於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聲明書〉（“Moriatur Pro Rege, Regina! A Statement of the Tru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wards the Person and Authority of H.I.M. the Empress Dowager”）與 1922 年收於〈《尊王篇》釋疑解禍論〉⁶⁵ 之異同，便能發覺「翻譯」問題再次浮現。此二文中，不變之處為辜氏對於慈禧的擁戴；差異處則有二：從文體層面而言，原於“A statement”開頭所引戈登之箴言已被刪去；在用詞與風格上，已然更趨近於古文文體。另外，「康有為」、「《字林報》」等名詞從未出現在“A statement”中，然而於〈解惑論〉中，「康黨」、「康有為」等字卻出現了超過數十次。⁶⁶ 此與辜鴻銘一貫的翻譯策略相合，唯此次從英文到中文的改譯中，他不僅消去了西方成分，更復原了專有名稱。

於此，在各階段中，辜鴻銘語言形式的差異有其意義，其中文書寫的演變以及對古文的追求，顯然遺老情節並不足以涵蓋之。自《張文襄幕府紀聞》到《讀易草堂文集》的語言變化揭示辜鴻銘如何不斷追求自己心目中的「中文」。而隨後出版於 1925 年的日譯本《辜鴻銘演講集》中，更收有辜鴻銘自身以文言寫成的講稿〈綱常名教定國論〉⁶⁷，必須留意到，辜氏於日本以英文進行演講，⁶⁸ 為

⁶⁵ 為了方便論述，此二文於後，簡稱〈解惑論〉及“A statement”。

⁶⁶ 如其中一段：“...so far from there being any truth in the ignorant, wild and reckless assertions of the foreign press as to the alleged reactionary policy of H.I.M.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as to her baneful influence on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 it will be the easiest thing in the world to prove the contrary.”（*Paper From a Viceroy's Yamen*, p.6）在〈解惑論〉中則為：「向來西人之疑皇太后，皆以為不喜西人，不用西法，莫不由康黨散佈謠言而起也。乃康有為反有《字林報》所刻之議論，則其前後自相矛盾，不辨自明。」（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223）

⁶⁷ 辜鴻銘著：〈綱常名教定國論〉，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262-265。

⁶⁸ 〔日〕薩摩雄次：「辜鴻銘先生的演講和論文基本上都是英文完成的，其演講都有詳細的英文原稿，因此整理起來十分便利。」見氏著：《辜鴻銘論集·說明》，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273。

何特地將中文文言講稿收錄於日譯本中？從辜鴻銘一貫的翻譯策略中可以發覺，他向來清楚意識到讀者的存在，甚至會因為不同國籍的讀者對於文章內容進行調整。而於日文本中收錄中文文言作品，必然有其原因。於此推論，中文文言的表達對於辜鴻銘而言，已然成為一種自我的表述，或者可謂「身為中國人」的象徵。於是，透過對辜鴻銘中文書寫的觀察，能夠發現其中文書寫的整體進程，顯露出其作為一境外華人之尷尬處境，對於古文的堅持，亦可視為某種文化焦慮。故於下文中，從胡適與辜鴻銘對於文學革命的論爭切入，觀察辜氏如何想像「中國性」與「中國傳統」，而成為革新時代中的一道雜音。

（二）新時代的舊中國：辜鴻銘的中國想像

前文已經論及辜鴻銘對於清廷有著不理性的強烈擁護，不僅數度撰文為慈禧辯護，更在清朝覆滅時以「遺老」自居，而他雖支持帝制，卻在袁世凱稱帝時進行了相當猛烈的批判，足見對於正統仍有其堅守的標準。此外，在文學與文化傳統上，辜鴻銘亦相當執著，最著名者，即是與胡適於 1919 年的關於文學改良的論爭。黃興濤於〈時代逆子：在五四前後的文化浪潮中〉一文中指出，五四以前，辜鴻銘的形象正面，然而五四過後卻轉為「一個抱殘守缺、頑固不化、性格和行為怪僻異常的舊式遺老。」⁶⁹ 此說或有修正空間，其實早於 1904 年《國民日日報彙編》中便收有〈辜鴻銘〉、〈辜鴻銘之無恥〉等文，內容批評辜鴻銘獻媚於慈禧、支持慈禧實施酷刑，而不能識破八股之弊病。可見辜鴻銘的守舊作風在民國以前便已引人非議。

在 1919 年間，辜鴻銘分別以英文發表了〈反對中國文學革命〉（“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以及〈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和教

⁶⁹ 黃興濤：〈時代逆子：在五四前後的文化浪潮中〉，《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頁 369-397。

育) (“Returned Stud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Literacy and Education”) 二文回擊批評者。在前文中，辜鴻銘首先反對了將文言文視為一種「死語言」之說，認為目前所有的報章雜誌皆是以文言寫成，故無所謂「死」。同時，他引用了莎士比亞的古英文詩，並將其譯為通俗英文作為對照，意圖凸顯兩段文字的差異以呈現文言與白話在文學中的美感差距。在後文中，辜鴻銘進一步地對胡適進行嘲諷，文中言論更顯激進，例如「我們中所有人，無論是外國人、軍事家、政治家，尤其是歸國留學生，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過上好日子，都應該為中國四億人口中 90% 不識字這件事每天感謝神。」⁷⁰ 等說法。然而，其中一段文字顯得特別突兀：

且有一事，如果 90% 的人不僅識字還懂得通俗（！）英文，那我們這些可憐的歸國留學生將不得不退居到非常不起眼的位置上；我們將無法說出像法國國王的話，那話即是現今我們在友誼社、集會和會議上以及我們拍往巴黎的電報中所說的：「我即國家——我們是中國」。⁷¹

此段文字之所以重要，關鍵在於其中充滿著辜鴻銘的焦慮：留學生的政治位置竟然成為他反對文學革命的重要原因。在後文中，他甚至主張「教育」與「識字」

⁷⁰ 引文為我所試譯，參考原文：“It seems to me that instead of complaining, all of us, foreigners, militarists, politicians and especially we returned students, who are now still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here in China, should give thanks to God every day in our lives for the fact that 90 percent of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in China are still illiterate.” 見清·辜鴻銘，“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Millard's Review*[Shanghai] 16 August 1919.

⁷¹ 引文為我所試譯，參考原文：“For one thing, if the 90 per cent of the four hundred million people were not only to become literate, but also to understand vulgate(!) English, we poor returned students would then have to take a very back seat; we would then not be able to say, like the French King, as we now do in our friendship bureau,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and in our telegrams to Paris, “L’etat cest moi—we are China.” 見清·辜鴻銘，“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Millard's Review*[Shanghai] 16 August 1919.

無關，認為識字越多、社會的道德水平越是低下，種種言論不僅激進，且已經與胡適等人提倡文學改良的原因沒有交集。更有趣的是，這樣的說法甚至與辜氏的自身經歷相互矛盾，因為他不僅擅長各國語言，更曾強調自己「花了二十年研究中國文字」⁷²。可以留意的是，於這段論辯中辜鴻銘將自己稱之為「歸國留學生」，而忽略了自己出生於檳榔嶼的背景。於前文中，我們已經發覺辜鴻銘在時人眼中的形象多為「歸國留學生」⁷³，對於其境外華人的身份並不留意。而辜鴻銘在撰文時，亦似是有意略過在新加坡任職、檳榔嶼生長的一段經歷，考其系列作品，除了收於《張文襄幕府紀聞》中的〈華僑〉一文，將范蠡視為華僑以外，⁷⁴ 皆未能見得相關資料。

將范蠡（B.C. 536- 448）稱為「華僑」，似乎於歷史事實上有其突兀之處，然而〈華僑〉一文短小，文中辜鴻銘亦並未將自己列於華僑之列，於是作此文的原因難以看出，亦不見相關討論。此處必須回到本文最初的提問：「再一次變成中國人」如何可能？與其說此句暗示了辜鴻銘曾有「不（夠）中國」的時刻，不如說，其反映出辜氏長久以來的文化焦慮：恐懼於自己無法說出「我們是中國」。而他「變成」中國人的具體實踐，即是透過中文以外的語言書寫及翻譯，不斷面向西方，以外語展示自己的中國身份與中國認同。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回應與肯定，也在不知覺間為他的作法背書。同時也必須思考，辜鴻銘變成了怎樣的中國人？從其書寫可以發覺，辜鴻銘筆下的「中國」或者「中國人」似乎同時包含了作為政權主體的「中國」，以及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此二種層次。隨著辜氏的文化主張與時代潮流發生衝突，文化中國與政權中國的定義，亦出現分歧。在

⁷² 清·辜鴻銘著，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 39。

⁷³ 除了芥川龍之介的誤記以外，在報章上關於辜鴻銘的記載亦多將其稱為留學生。如《國民日日報彙編》中收有胡適：〈辜鴻銘〉：「其前為蘇格蘭大學卒業生也。」見胡適：〈辜鴻銘〉，《國民日日報彙編》1904 年第 2 期，頁 4-6。

⁷⁴ 清·辜鴻銘：〈華僑〉，收於黃興濤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 453。

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影響範圍逐漸擴張、成為主流的二十世紀初，擁有著西方文學碩士學位的辜鴻銘，卻因為堅持傳統、拒絕西化，顯得相當不合時宜，亦引起過許多批評。

舉例而言，辜鴻銘堅持留辮的作為引發不少嘲笑，亦曾作文〈在德不在辮〉捍衛髮辮。⁷⁵ 黃興濤則認為，辜鴻銘對於留辮的捍衛實包含了文化動機，所謂「髮辮」，實是象徵了辜氏長久以來所護衛的中國文化意蘊。⁷⁶ 事實上，辜鴻銘與時代不合諸種作為，反而使其中國想像清楚顯現。於此必須留意，由日人所翻譯出版的《辜鴻銘演講集》一書中收有〈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一文，文中提到：

我下面說的話諸位可能要吃驚，實際上連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應該說今日的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那是中國的精神。⁷⁷

《辜鴻銘演講集》一書出版於 1925 年，此時距離清朝結束已過十年以上，在這段過程中，辜鴻銘反覆認為日本保留了唐宋時期的中國文化，而這樣的文化才是真正「中國的精神」、「真的中國人」。此說並非單獨出現於此文中，據日人薩摩雄次對辜鴻銘的紀錄，在晚年時辜鴻銘時常對他表示能夠來到「依然保存著唐宋文化的日本是多麼的高興，唯有日本才是自己永久居住的地方。」⁷⁸ 於此可以發覺，辜鴻銘的中國想像隨著時代轉變出現了不同的面貌。在政論集如《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等作中，辜鴻銘經常為慈禧太后與清朝政

⁷⁵ 清·辜鴻銘：〈在德不在辮〉，收於黃興濤編譯：《辜鴻銘文集·上》，頁 464-465。

⁷⁶ 黃興濤：《辜鴻銘·二：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頁 34-38。

⁷⁷ 清·辜鴻銘：〈中國文明的復興與日本〉，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276。

⁷⁸ 〔日〕薩摩雄次：〈追憶辜鴻銘先生〉，收於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下》，頁 341。

權辯護，文中的「中國」時常與西方國家相對，可見出所謂「中國」或「中國人」背後中的所蘊含的國家概念。然而另一方面，亦可看出其於〈在德不在辯〉等作中，將某種「文化傳統」本質化，並喻之為「中國」。換言之，當辜鴻銘嘗試劃分出西方與中國兩個二元端點時，所謂「中國」既是同時包含著政體、國籍的概念，亦重新鑄造了某種文化的想像於其中。然而，隨著新時代的來臨，所謂「中國文化」的概念自中國內部發生轉變，隨著時間發展，辜氏對於民國以後的文化與政治現象已無能為力，於是將「中國人的精神」本質化為「唐宋文化」，認定：唯保有這種精神，才足以稱為「中國」。

綜合以上現象，可以發覺辜鴻銘筆下的「中國」有其多重性，既透顯出了自己對於身份認同的焦慮，亦包含時代新舊的辯證。將儒學經典推廣西方的嘗試，在自身翻譯策略使用下造成矛盾：當辜鴻銘自身亦是透過英文來認識中國文學時，⁷⁹ 其所聲稱的「對西方推廣中國文化」，實際上表現出一種「回到中國」的意圖；同時，亦在削去中文特質的歸化翻譯之下，重塑了西方世界中的中國樣貌。以此為前提觀察辜鴻銘的中文書寫，其持續進展的語言能力值得留意，其中所展現的動態演變，即是辜鴻銘不斷嘗試「變成中國人」的過程與標記。

四、小結與餘論：從華夷到新舊的辯證

總結以上，本文以文化翻譯作為出發點，切入辜鴻銘的雙語寫作，並且將其中文書寫也視為廣泛意義上的翻譯，之所以關注辜氏的母語問題，則是延續石靜遠於《華人離散的文本與聲音》中對於母語的挑戰及所謂「語言所帶來的歸屬

⁷⁹ 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彙編：《文史資料選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輯，頁183-184。

感」(linguistic nativity)的討論。正如蔡建鑫所提示的，在此概念中，「一方面語言建構出所謂的本土意識，另一方面本土意識加強我們對某個語言的向心力。此事大多數的本土主義者或是國族主義者都選擇性忽略。」⁸⁰而在辜鴻銘的案例中，更能夠清楚地發覺，中文作為他的後天語言，如何在其國族認同上賦予了他歸屬感與認同感；而矛盾的是，他與中文卻又是相對陌生的，於是其認同、歸屬必須仰賴其他語言（多為英文），以及徘徊於中英之間的翻譯實踐，才能透顯而出。

而此一個案的特殊性並不止於此，若將文學史的因素納入考量，則可發覺辜鴻銘對於中國的想像，在萌芽之時便已不合於時代潮流，他對傳統的諸多捍衛，在新時代中顯得頑固而難以對話，然若是細考其作，卻能發覺因為辜鴻銘的離散背景與教育養成，其中文作品實際上早已偏離了傳統的軌跡；這樣難於定位的書寫實踐，其實反映出辜鴻銘對於自己無法代表中國、中國無法成為歸屬的焦慮。更無可否認的是他對於西方文學的熟悉，在某種程度上，辜氏也明白這是自己最有利的武器，透過流利的英文書寫，以及中西文化對照的策略，他博得國際聲譽的同時，也不自覺地迎合著西方國家的東方想像。並且，由於自身與中文／中國的疏離，辜氏在中西文化間創造文學／文化對等性的種種作為，則已然在無意識間使得中文傳統文本歸附於世界經典之中。無論是從韋努蒂或石靜遠的角度觀之，這樣的實踐其實僅是擴大了英文文學世界的政治權力，更諷刺的是，與辜鴻銘一貫的政治理念相互違背。故本文以辜鴻銘語「再次變成中國人」為題，意圖強調辜鴻銘所面臨的、在國族與語言之間的尷尬困境，透過此一特殊例子，亦能見出當華與夷交互辯證、時代新舊出現融混之時，文學個體於其中的掙扎與矛盾。

⁸⁰ 蔡建鑫：〈點評《華人（文）離散中的聲音與文字》〉，頁 159。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林紓著，李家麒等編：《林紓詩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 清·曾樸：〈曾先生答書〉，收錄於《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第4冊，卷8，頁1125-1139。
- 清·辜鴻銘, *Higher Education : 大學 A New Translation*. 中國竹海網(The Bamboo Sea) 網址：<https://thebamboosea.wordpress.com/2012/04/13/ku-hung-ming-higher-education/> (最後檢索日期：2020/08/31)
- _____, *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 Taipei, Taiwa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r. Ku Hung-ming's Works, 1956.
- _____, *春秋大義: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 Taiwa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r. Ku Hung-ming's Works, 1956.
- _____, *尊王篇: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Shanghai: Mercury, LTD. 1901.
- _____, *斯文在茲: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8.
- _____, "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Millar's Review, July 12, 1919。收錄於《密勒士評論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
- 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 〔英〕科伯(William Cowper)著，辜鴻銘譯：《痴漢騎馬歌》，Taipei, Taiwan: Committe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r. Ku Hung-ming's Works, 1956.

〔英〕毛姆（Maugham W. Somerset），*On a Chinese Scree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2.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中國人民政治協會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彙編：《文史資料選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8輯。

黃興濤：《辜鴻銘——文化怪傑：辜鴻銘評傳》，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年。

——：《辜鴻銘·二：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年。

鄭文泉編：《辜鴻銘、林文慶與馬、中百年學術史》，雪蘭莪：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2019年。

嚴光輝：《辜鴻銘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法〕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著，羅國祥譯：《文學世界共和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美〕勞倫斯·韋努蒂（Laurence Venuti）著，蔣童譯：《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北京：商務出版社，2019年。

〔美〕石靜遠（Tsu Jing），*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單篇論文

朱介國：〈探討辜鴻銘《英譯大學》的「三綱」與「八條目」之知識論傾向〉，《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4月，頁21-40。

DOI:10.29989/ZGWHDXZWXB.201104.0002

殷麗：〈辜鴻銘漢譯英詩中的歸化翻譯——以《痴漢騎馬歌》為例〉，《瀋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2期，2014年4月，頁242-245。

馬飛、顧發良：〈靈活對等、辭氣相副：《痴漢騎馬歌》意譯法西論〉，《富洋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總第149期，頁59-61。

蔡建鑫：〈點評石靜遠《華人（文）離散中的聲音與文字》〉，《中外文學》第44卷第1期，2015年，頁153-162。DOI:10.6637/CWLQ.2015.44(1).153-162

（三）學位論文

王雷：《民國初年前清遺老群體心態剖析》，廣西：廣西師範大學社會文化與旅遊學院碩士論文，2000年。

蔡佩蓉：《清季駐新嘉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四）報章雜誌

胡適：〈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晨報六週年增刊》第12月期，1924年12月，頁267。

胡適：〈辜鴻銘〉，《國民日日報彙編》，1904年第2期，頁4-6。

陳其華：〈我所認識的辜鴻銘先生〉，《人間世（辜鴻銘特輯）》第12期，1934年9月，頁45-46。

溫源寧（Wen Yuan-Ning）：“Ku Hung-Ming,” *T'ien Hsia Monthly* [shanghai] April 1937, pp.386-390.

〔日〕芥川龍之介著，夏丏尊譯：〈芥川龍之介氏的中國觀・辜鴻銘氏〉，《晨報副刊》，1926年6月12日，頁27-28。